

国际发展经济学综述

毛日升 蒋尉 宋锦*

发展经济学科涉及的面很广,我们根据本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在以下3个方面对本学科2013年以来的发展进行综述:

一、产业结构升级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持续处于低迷阶段,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开拓寻找新的增长点,通过参与市场竞争和强化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高端化和产品质量升级,走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这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途径。尽管这些研究问题非常重要且研究文献不胜枚举,但近年来特别是2013年的相关研究出现许多新的发展趋势,与之前的相关研究相比,该领域的研究内容和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主要关注进口竞争或者其它因素对一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这些研究更加注重基于大样本的微观经验数据,详细探讨外部竞争对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并且与传统的度量产品质量方法不同,很多学者提出了更符合实际,更加科学的测度产品质量的经济学方法。

(一) 关于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

其一,制度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Henn等(2013)^①利用178个国家1962-2010年的详细的贸易数据,采用不同的方法测度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质量变化,他们的研究表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质量在经济发展的起始阶段提升最为迅速,随着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产品质量逐渐趋于收敛,不同国家产品质量的变化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对于任何产品的生产过程,质量都会逐步趋向于世界的前沿水平;另外,改善制度、增加人力资本都会显著的促进产品质量的提升,他们的研究还表明通过提升国内的总体制度性环境因素要比特定的产业政策会对产品质量升级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

其二,贸易自由化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Ardelean和Lugovskyy(2013)^②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产品质量恩格尔消费曲线(Quality

* 毛日升、蒋尉、宋锦,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助理研究员。

① Henn C, C. Papageorgiou, N. Spatafora. 2013. "Export Qu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MF Working Papers*, WP/13/108.

② Ardelean A, V. Lugovskyy. 2013. "Trade Liberation and Quality Upgrading: Evidence from the U. S. Consumer Expenditure Data." *ETSG Working papers* 344.

Engel Curves, QEC) 的影响作用, 他们的研究表明: 一方面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关税水平的上升会造成发达国家的消费者购买更多发展中国家低质量产品进行消费, 致使发达国家的 QEC 曲线变得更为平坦。另一方面, 发展中国家更低的关税会引致更多的技术转移, 从而使发展中国家更容易依赖低成本优势提升促进产品质量升级, 从而可能造成发达国家的 QEC 曲线变得更为陡峭。他们利用美国 1988—2007 年的消费者调查数据对上述理论分析结论进行了验证, 经验结果很好地支持了理论分析结构, 随着美国关税水平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关税水平的下降, 美国的 QEC 曲线最初变得更为平坦, 对于服装等技术转移空间小的行业, 上述效应尤其明显。而对于技术转移空间较大的行业, 关税下降最初会使 QEC 变的平坦, 但随着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提升, QEC 曲线的变化趋势出现了逆转。Curzi 等 (2013)^① 基于 1995—2007 年欧盟 15 国和 70 个国家双边细分贸易产品数据, 利用产品单位价格 and 市场份额测度贸易产品质量的基础上, 考察了进口竞争对欧盟农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作用。他们的研究同样表明进口竞争与欧盟农产品质量升级之间存在非单调的关系, 对于产品质量处于世界前沿的农产品进口会显著促进农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 而对于产品质量与世界前沿水平有较大差距的农产品, 进口竞争对农产品质量升级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事实上, 产品质量反过来也会影响贸易的模式及强度。Fasil 和 Borota (2013)^② 通过一个理论框架考察了产品质量和劳动力的效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及其内部贸易模式和贸易强度的影响作用。他们的理论框架基于一个南北四国贸易模型并且考虑了产品质量和成本效率两个维度产业内部的异质性, 将理论模型与南北国家出口在世界市场的出口份额相匹配, 模型模拟的结果能够很好地解释不同国家之间及其内部的贸易模式。同时该理论模型对于产业内部不同种类产品的竞争力源泉给出了较好的解释。Hallak 和 Sivadasan (2013)^③ 考虑两种维度的企业异质性, 区分了“过程生产率”和“产品生产率”, 过程生产率表示大多数文献中采用的标准生产率概念, 而产品的生产率专指企业生产高质量产品的能力。结合贸易成本与产品质量之间的假设条件, 他们将这两种生产率纳入了贸易理论模型, 其理论推导的结果验证了已有的多数经验研究结论: 控制厂商大小的情况下, 出口厂商会销售更高质量的产品, 对产品的定价也更高, 同时也会对中间产品投入和工人支付更高的价格和报酬, 并且产出的资本密集度也更高,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 他们利用印度、美国、智利、哥伦比亚厂商层面的数据对理论分析结论进行了详细的验证, 经验结论很好地支持了他们的理论结论。

其三, 进口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有: Fernandes 和 Paunov (2013)^④ 利用智利 1997—2003 年细分的贸

① Curzi D, Raimondi V, Olper A. 2013. "Quality Upgrading, Competition and Trade Policy: Evidence from the Agri - Food Sector."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Trade Research Consortium's (IATRC's) 2013 Symposium: Productivity and Its Impacts on Global Trade, June 2 - 4, Seville, Spain.

② Fasil C. B, Borota T. 2013. "World Trade Patterns and Prices: The Role of Productivity and Quality Heterogene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1.

③ Hallak J. C, J. Sivadasan. 2013. "Product and Process Productivity: Implications for Quality Choice and Conditional Exporter Prem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 (1) .

④ Fernandes A. M, C. Paunov. 2013. "Does Trade Stimulate Product Quality."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46 (4) .

易和企业数据, 同样考察了进口竞争对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作用, 研究表明进口竞争显著地推动了智利产品质量的提升, 进口竞争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对产品质量升级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是企业通过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来摆脱进口竞争带来的压力, 二是在进口竞争压力下, 企业生产会通过采用更多的进口中间产品, 同样会促进产品质量水平的提升。

(二) 出口质量的影响因素

为什么大力关注出口品质量? 因为它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升级十分重要。戴祥、张雨(2013)^① 在大量调研问卷基础之上, 以昆山本土制造业企业为样本, 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了开放条件下我国本土企业升级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经验研究表明: 在有效控制企业创新活动、企业人力资本以及企业规模相关变量后, 出口因素对本土企业升级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作用, 从而证实了“出口中学习”效应的存在; 为外资企业提供外向配套, 不仅为本土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激励和可能, 也为吸收跨国公司消极型和积极型“技术外溢”等提供了重要机会, 从而有利于本土企业升级能力的提升; 产业集聚效应同样对我国本土企业升级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 说明在开放条件下形成的产业集聚在现阶段所带来的技术扩散和外溢效应是显著的。Rodrik (2013)^② 主要考察了全球不同国家制造业和出口产品质量趋于收敛的问题, 利用全球 118 个国家最近数十年的相关数据, 研究表明不同国家的制造业内部劳动生产率都趋于无条件收敛的趋势, 一小部分国家在 2 位码制造业层面呈现显著的 Sigma 收敛趋势, 但在国家总体层面却并不存在收敛的趋势, 主要原因是低收入国家制造业就业比较小并且其工业化进程较为缓慢。

2013 年的研究认为, 影响出口品质量的因素如下:

其一, 进口对出口品质量的影响。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主要有 Amitand 和 Khandelwal (2013)^③, 他们基于细分的贸易产品数据, 同时采用市场份额和单位价格更加准确细致的测度了贸易产品的质量, 并且主要考察了来自低收入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进口竞争对美国产品质量提升的具体影响过程和程度, 研究表明来自低收入国家的进口竞争同美国企业的产品质量升级存在非线性的正向关系, 进口竞争对处于前沿技术水平厂商的产品质量会产生正向刺激作用, 而对处于技术落后状态厂商的产品质量升级会产生负面影响作用。

其二, 外部竞争如何影响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目前还没有基于微观数据的论文。关于中国贸易产品质量的相对变化, Vandenbussche 等 (2013)^④ 发现对比中国和欧盟国家在服装行业的出口产品单位价格和出口产品市场份额的相对变化状况, 欧盟国家在细

① 戴翔、张雨 (2013): “开放条件下我国本土企业升级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昆山制造业企业问卷的分析”, 《经济学》(季刊), 第 4 期。

② Rodrik D. 2013. “Unconditional Convergence in Manufactur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8 (1) .

③ Amity M, A. K. Khandelwal. 2013. “Import Competition and Quality Upgrading.” *The Reviews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5 (2) .

④ Vandenbussche H, F. D. Comite, L. Rovegno, C. Viegelaahn. 2013. “Moving up the Quality Ladder? EU - China Dynamics in Clothing.” *Journ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28 (2) .

分的服装产品出口单位价格要普遍高于中国,但相对差距在逐步地缩小;中国的出口产品尽管单位价格在逐步提升,市场份额同样呈现增加的势头,表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相对于欧盟国家在稳步提升,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动态变化过程体现在核心产品不断进入和退出。

其三,信贷约束对出口质量的影响。Ciani 和 Bartoli (2013)^① 利用意大利 2011 年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信贷约束对中小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作用。由于意大利的中小企业严重依赖银行系统对贸易和生产成本提供融资支持,当市场信贷收紧会对较低生产率的出口厂商的产品质量升级产生显著的影响。信贷约束会显著降低生产率较低出口商产品质量的升级,对于出口市场主要针对欧盟以外以及中等企业的产品质量的升级影响作用尤其明显。同时,信贷约束对于贸易的影响同时体现在广度边际和深度边际上。

其四,汇率对出口的影响:基于产品质量的异质性。Chen 和 Juvenal (2013)^② 考察了出口厂商在产品质量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汇率变动对其出口产品需求弹性的影响作用,利用阿根廷 2002—2009 年葡萄酒行业高度细分的厂商和产品层面数据,同时基于葡萄酒的等级分类界定产品的质量,发现如下结论。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汇率贬值对出口产品的需求弹性影响作用会下降,高质量的出口厂商出口行为更符合基于市场定价 (PTM) 的理论预期,在汇率贬值的条件下,出口高质量产品的厂商更可能通过提升价格,而不是通过增加出口产品数量来增加边际收益,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厂商尤其如此。

二、劳动力市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关于政府发展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林毅夫、陈斌开 (2013)^③ 从理论上探讨了政府发展战略通过劳动力市场影响收入分配的机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减少劳动力需求,进而降低均衡工资和劳动者收入,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当政府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时,收入分配差距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持续下降。当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经济发展可能停滞,收入分配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 形特征,且稳态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基于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城市化所需时间也 longer。

从劳动力要素的积累情况来看,中国想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创新水平,就必须提高劳动力的教育和技能水平。我国劳动力的素质普遍不高。2010 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中国 7.61 亿的劳动力大军中只有 10% 受过大学教育,而这一比例在韩国、日本和美国都高于 40% (OECD, 2013)^④。

关于人力资本测度,李海峥等 (2013)^⑤ 通过改进国际上广泛使用的人力资本综合度量

① Ciani A, Bartoli F. 2013. "Export Quality Upgrading and Credit Constraints." *ETSG Working Paper*, No. 134.

② Chen N, Juvenal L. 2013. "Quality, Trade and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DP9744.

③ 林毅夫、陈斌开 (2013): "发展战略、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经济学》(季刊),第 4 期。

④ OECD. 2013. "Labor Migration, Skills and Student Mobility in Asia." (<http://www.oecd.org/migration/Labour-migration-skills-student-mobility-in-Asia.pdf>).

⑤ 李海峥、贾娜、张晚蓓、Barbara Fraumeni (2013): 中国人力资本的区域分布及发展动态,《经济研究》,第 7 期。

方法—Jorgenson - Fraumeni 收入法, 结合扩展的人力资本 Mincer 模型, 构建了适合中国数据的省级人力资本估算方法, 并通过建立省际生活成本平减指数解决了人力资本的横向比较问题。文章运用该方法估算了代表不同发展水平的六个省(市): 上海、广东、河南、湖北、贵州和甘肃的人力资本水平, 建立了跨省跨时间可比的分城乡 1985—2009 年省级年度人力资本综合度量指标及相应人力资本指数。结果显示总人力资本广东最高, 人均人力资本上海遥遥领先, 而贵州和甘肃均排在最后。计算结果定量描述了省级人力资本的分布及发展动态, 并初步形成中国省级人力资本面板数据。

对于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因素方面, 王智勇 (2013)^① 认为个人的成长环境显著影响了人力资本从而影响收入。文章利用 2004 年家庭动态调查数据证明: 成长于大城市的个体, 其收入水平比成长于中等城市以下的个体在同等教育程度的条件下更高。环境优越的个体, 人力资本形成越有优势, 形成马太效应, 推动了人力资本的差异化。城乡和区域资源配置的差异会对城乡和区域收入差距形成持续的负面影响, 而后者也会进一步加剧城乡和区域的不平等, 从而在两者之间形成恶性循环。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需要通过政府加大对于农村和落后地区的扶持, 增加农村和落后地区资源配置。

关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 黄燕萍等 (2013) 放松了传统理论中不同层级的人力资本具有完全替代性的假设, 通过生产函数、技术创新与模仿方程的设定, 导出了具有经济理论基础的计量回归模型, 然后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研究了不同层级教育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 初级教育和高级教育都能促进经济增长, 但二者的作用方式不同, 其中初级教育作为生产要素直接促进最终产出, 高级教育则通过加快技术创新与模仿的速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现阶段的社会经济结构条件下, 我国初级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高级教育; 高级教育对中西部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东部。最后, 本文对我国教育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协调问题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从人力资本积累对收入的影响来看, Liang 和 Chen (2013)^② 指出, 我国有一半的劳动力仅具有初中文化水平, 对农村劳动力进行技能培训能够显著增加农村家庭的收入。关于教育回报的个体异质性, 简必希、宁光杰 (2013)^③ 发现, 个体之间的教育回报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文章根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CHNS) 1997 年和 2006 年的数据, 在考虑选择偏差和个体异质性的基础上, 运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 分别估计了中国前后十年高中和大学的教育收益率。估计结果显示: 个体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十年间各阶段教育的平均收益率都显著提高; 高中的年收益率均大于大学, 而大学的三项政策效应差距有缩小的趋势。关于教育回报的地区异质性, 邢春冰、贾淑艳、李实 (2013)^④ 使用 200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 2011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发现农民工教育回报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东部地区和发达城市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比较两个年份的结果可以看出, 农民工的总体教育回报率有所降低, 地区间回报率的差异也有所降低, 并呈现出向均值收敛的特征。教育回报率的地

① 王智勇 (2013): 成长环境与人力资本形成, 《经济研究》, 增刊第 1 期。

② Liang and Chen. 2013. (<http://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16197/82053.pdf?sequence=1>).

③ 简必希、宁光杰 (2013): “教育异质性回报的对比研究”, 《经济研究》, 第 2 期。

④ 邢春冰、贾淑艳、李实 (2013): “教育回报率的地区差异及其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经济研究》, 第 10 期。

区差异对不同教育水平劳动力的相对迁移概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文章因此得出结论：进一步减少流动障碍，促进农民工合理流动将有助于提升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世界银行(2013)^①指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工实际工资基本没有增长，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市场回报一直很高。2005年前后以来，不同技能水平、不同地区之间的劳动力工资水平表现出明显的趋同态势，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增长尤为迅速。尽管迄今为止生产率增长仍快于工资增长，这一现象仍值得关注。

劳动力流动性是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世界银行(2013)^②认为，劳动力流动性显著提高增强了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维持了中国低工资的增长模式。盖庆恩等(2013)^③采用宏观方法验证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经济结构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文章在封闭的两部门经济中引入劳动力市场构建理论模型，并使用1980—2009年间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存在扭曲，并没有随时间而减弱，控制部门间人力资本差异后的年均扭曲指数为0.24，即农业的工资水平仅相当于非农部门的24%；其次，劳动市场扭曲会显著迟滞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若消除扭曲，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比将下降26.38%；最后，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使过多的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会带来显著的效率损失，年均潜在损失达到16.34%。若消除劳动力市场扭曲，中国劳均产出可增加19.53%。宋锦、李实(2013a)^④以职业分布为视角，采用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考察了户籍身份对于劳动者职业机会的影响，估计了我国城乡户籍一元化改革对不同户籍劳动力取得好职业概率的影响。文章发现，不同户籍身份的劳动者在职业分布上存在显著的差距，城乡户籍一元化改革改善了本地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分布状况，减轻了他们在职业机会上面临的户籍歧视。然而，其他户籍身份的劳动者并没有在一元化改革中受益，改革之后本地农村劳动力对其他劳动力产生了挤出效应。考虑到外地城镇和外来农村劳动力原本在迁入地的就业竞争中就不占据优势，本地农村劳动力对他们的挤出实际上提高了他们在迁入地职业机会上所面临的户籍门槛，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区域间分割实际上被加强了，这很可能影响到改革地区未来劳动力供给的来源和规模。类似地，宋锦、李实(2013b)^⑤考察了1997—2000年之间实行的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对人口流动及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影响，发现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吸引了劳动年龄人口、远距离、年轻和文化程度略高的外来劳动力。从职业机会来看，户籍政策的松动对于不同户籍身份劳动力的影响是不同的。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对于各类户籍身份的外来劳动力获得好的职业机会都有帮助，优化了劳动力资源配置，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本地农村劳动力获得白领职业的机会。万海远、李实(2013)^⑥评估了户籍制度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通过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的方法克服个体户籍类型的自选择和样本偏差

① 世界银行(2013)：《2013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② 同上。

③ 盖庆恩、朱喜、史清华(2013)：“劳动力市场扭曲、结构转变和中国劳动生产率”，《经济研究》，第5期。

④ 宋锦、李实(2013a)：“城乡一元化户籍改革影响劳动力职业分布”，《世界经济》，第7期。

⑤ 宋锦、李实(2013b)：“小城镇户籍改革对劳动力市场职业分割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第10期。

⑥ 万海远、李实(2013)：“户籍歧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经济研究》，第9期。

问题,重点考察了近年来户籍属性发生转换的群体来估计户籍歧视的作用。结果表明,仅仅因为户籍职业选择歧视,农户个体的收入将会减少 3.5%。在剔除户籍歧视因素后,整体收入差距会明显下降,平均来看,基尼系数会从 0.499 下降为 0.488,显示现有户籍制度是劳动力资源流动的重要制度性障碍。从我国的劳动力迁移趋势来看,目前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仍然是沿海地区,虽然随着中西部地区的迅速发展,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地区收入差异在 2000 年之后不断减小,但农民工的就业分布仍然不令人满意:60% 以上的农民工目前都集中在非正规部门就业,从非正规部门向正规部门的流动非常少。Giles 等 (2013)^① 指出这主要与农民工的合同期限较短和农民工很难被正规部门的社会保障覆盖相关。李云森 (2013)^② 考察了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应用倾向分数匹配方法以控制父母外出的自选择问题以及其他因素导致的可观测的异质性问题。2000 年甘肃省儿童和家庭调查 (GSCF) 数据显示,父母一方或者两方外出半年以上对孩子语文成绩能否进入年级前 20%、数学成绩以及认知能力测试成绩是否进入年级前 10% 都有显著为负的影响。这可能解释了我国农民工越来越倾向于举家迁移的趋势性变化。Demurger 等 (2013)^③ 指出,2011 年有子女的农民工中有 72% 的人将子女带入城市生活。

从劳动力市场所面对的宏观环境来看,世界银行 (2013)^④ 指出,中国的劳动力队伍不断扩大,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1980 年,中国劳动力数量为 6 亿,2015 年预计将达到 10 亿的峰值。2015 年之后,劳动力总量开始下降,初始速度较低,但从 21 世纪 20 年代后期会迅速加大,预计 2050 年将比最高点减少 15% 以上。而日益减少的劳动年龄人口需要供养日益增长的老龄人口,社会抚养比不断增大。中国需要能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的劳动力队伍,需要确保劳动者能继续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拥有可靠的劳动保护。需要努力的政策方向可能包括几个方面。首先,要降低劳动力流动障碍,确保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权益的可携带性,分阶段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所有居民同等享有一体化的社会福利。其次,要增加现有劳动力队伍的劳动供给,通过提高退休年龄等措施确保城市中老年和女性劳动力不会过早地退出劳动力市场。第三,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保持劳动者利益与产业竞争之间的平衡性,尤其是降低劳动课税,建立更完善的工资形成机制。马弘、乔雪、徐嫒 (2013)^⑤ 认为,过去三十年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总量增长,经济结构特别是就业结构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和转型。1998—2007 年工业企业的微观就业数据显示,中国的制造业同时经历了大规模的就业创造与就业消失,平均就业净增长为正,且在 2002 年以后达到 3%—7% 的净增长;

① Giles John, Albert Park, Cai Fang. 2013. "Weathering a Storm: Survey - Based Perspectives on Employment in China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Arup Banerji, David Newhouse, David Robalino and Pierella Paci (eds.) *Labor Marke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 Impacts and Policy Responses*.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② 李云森 (2013): "自选择、父母外出与留守儿童学习表现—基于不发达地区调查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第 3 期。

③ Demurger Sylvie, Shi Li, Hui Xu. 2013. "Internal Migration, Family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Happiness in China." *Working Paper*. (<http://www.hhs.se/contentassets/c9558a10642a49d9815e5b09f189b9dc/internal-migration-family-living-arrangements-and-happiness-in-china.pdf>).

④ 世界银行 (2013):《2013 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⑤ 马弘、乔雪、徐嫒 (2013): "中国制造业的就业创造与就业消失",《经济研究》,第 12 期。

就业创造和消失在不同行业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异,消费品行业是创造就业最多的行业,而传统制造业的就业消失最多;私营企业就业创造率高于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就业消失率最高;企业越年轻,其就业创造率(消失率)就越高(低),因此对应的就业净增长率也就越高;南部沿海地区有着最高的就业创造率,与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地区一起经历了就业净增长,而内陆地区则经历了就业的负增长,其中以西北和东北这些传统经济的工业生产基地最为严重;就业再分配中,组内的就业流动占据主导地位;除此之外,不同年限企业之间和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就业流动贡献较大。都阳(2013)^①利用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企业对劳动力成本冲击和金融危机造成的需求冲击的反应。估计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产出弹性值较高,达到0.75—0.78。对低技能工人的需求工资弹性为-0.4,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工资弹性为-0.53。而且,不同类型工人之间的替代弹性为0.26。经验分析表明,企业已经对要素价格信号的变化产生反应。在未来,如果能够保持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确保不同类型的企业有公平的竞争环境,要素市场的变化就有可能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和升级。孙楚仁等(2013)^②通过构建一个包含企业异质性和最低工资在内的两国、两要素贸易模型,考察了最低工资和企业生产率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最低工资的提高将通过选择效应(即迫使低效率企业退出出口市场)降低企业的出口概率,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导致的价格效应将降低企业的出口额,而生产率增加将同时提高企业的出口概率和出口额。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工业企业1998—2007年相关数据和相关城市最低工资数据验证了这种影响并估计了影响的规模。

从劳动力收入来看,世界银行(2013)^③提出,21世纪前十年中国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有所下降,这可能是导致不平等加剧的因素之一。1990年到2004年,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一直在60%左右,但到2008年急剧下降到不足40%。自2008年以来,虽然有了一些回升,整体比重下降的趋势值得关注。需要考虑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劳动者没能分享到他们应得的增长份额,还是因为劳动力转向资本密集的城市经济而出现的暂时现象。范红忠等(2013)^④指出,我国职工和包含农民工在内的非职工就业人员在就业生命时间和就业稳定性方面有着很大差异,职工的收入接近其持久收入,具有较高的持久性,而非职工的收入持久性较低。该文采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我国劳动者收入中,职工收入占比和非职工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有显著的正影响,职工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弹性较大,接近单位弹性,而非职工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弹性相对较小。规范劳动合同,提高我国劳动力就业生命时间和就业稳定性,进而提高我国居民的职工收入占比是提高居民消费率的有效途径。魏下海等(2013)^⑤研究了工会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利用2010年全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进行经验验证。结果表明,工会导致企业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升,但由于后者的升幅

① 都阳(2013):“制造业企业对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反应:基于微观数据的观察”,《经济研究》,第1期。

② 孙楚仁、田国强、章韬(2013):“最低工资标准与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经济研究》,第2期。

③ 世界银行(2013):《2013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④ 范红忠、黄永明、连玉君(2013):“就业生命时间、劳动者收入的持久性与我国居民消费率——基于省际职工收入占比和非职工收入占比的面板数据分析”,《经济学》(季刊),第4期。

⑤ 魏下海、董志强、黄玖立(2013):“工会是否改善劳动收入份额?—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第8期。

更大,因此劳动收入份额反而下降了。这种影响程度在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存在差异。还有一些研究考察了性别之间劳动收入的差异性。卿石松、郑加梅(2013a)^①引入了职位晋升机制的收入差距分解方法,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了职位隔离对性别收入差距的作用,且在统一的模型框架内识别和估计了职位内工资歧视(同工不同酬)和晋升歧视的程度。研究发现,女性过多地集中于职位“金字塔”结构的底层。尽管职位晋升的工资效应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约41%的性别收入差距是由于职位隔离导致的。工资歧视是职位层级内部性别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与之类似,职位晋升歧视能够解释1/4的性别收入差距。因此,除了同工同酬政策,促进职位晋升的机会平等是缩小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意即“同酬”还需“同工”。卿石松、郑加梅(2013b)^②利用2007、2008年“中国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就业能力调查”数据考察了同等教育程度上专业隔离对男女大学生起薪差距的作用。研究发现,尽管专业分布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男女大学生起薪差距主要来源于专业内部,专业内起薪差距只有28.65%—43.16%能够被就业能力和实习经历等生产力特征变量的差异所解释。由于针对男女大学生起薪差距的分解,可以剥离市场工作经验、晋升和生育等因素的影响,这一研究发现为性别歧视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性证据。贾男等(2013)^③通过生育对女性收入的影响来研究家庭的生育需求,估计了不同类型的女性生育陷阱的不同影响程度。研究发现,生育对女性的工资收入在生育当年有显著的高达18%的负面影响,对外生类型的女性这一影响尤为显著,这会显然影响这部分女性的生育需求。陈昊等(2013)^④考察了企业出口对女性劳动力就业绝对量与相对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对企业就业性别歧视究竟产生怎样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出口持续度,这一结论并不受到女性绝对就业量与相对量差异的影响;工资水平的提高加剧了高、中度持续出口企业的就业性别歧视,对低度持续出口企业的影响却并不显著;对于规模越小、企业盈利能力越低的企业而言,出口贸易越能够缓解就业性别歧视;外资对出口企业就业性别歧视的影响还当存疑。

三、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综合性战略问题,涉及环境、技术、经济、政治、法律等多个领域。气候变化经济学作为集环境经济学、能源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于一体的交叉学科,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独特的研究理论、方法和领域。近年来伴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不断升温,该学科日益受到各国研究机构的高度重视,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IPCC的科学评估报告、《斯特恩报告:气候变化经济学》、《郇若素气候变化报告》及《中国气候与环境演变》等。

鉴于气候变化的外部性、累积性和全球公共产品特性,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是基于环境外

① 卿石松、郑加梅(2013a):“‘同酬’还需‘同工’:职位隔离对性别收入差距的作用”,《经济学》(季刊),第2期。

② 卿石松、郑加梅(2013b):“专业选择还是性别歧视?—男女大学生起薪差距成因解析”,《经济学》(季刊),第3期。

③ 贾男、甘犁、张勃(2013):“工资率、‘生育陷阱’与不可观测类型”,《经济研究》,第5期。

④ 陈昊、陈建伟、赵春明(2013):“出口持续度与女性就业:基于企业数据的反事实分析”,《经济研究》,增刊第1期。

部性和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之上的。2013年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气候变化的理论研究(主要是成本从外部性到内部性的经济学转化);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路径和减排手段的经济学分析;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对极端气候灾害做出预警的政策和途径;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国际气候制度,实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公平;以贴现率的方法解决基于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代际公平等。从近年来权威期刊的文献观察,该领域研究方向越来越侧重于现实应用,以及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其研究方法和工具也更加贴近于实际需求。

(一) 气候变化的理论

代表人物 Nordhaus 专注于气候变化减缓方案及影响的成本效益分析。他修改了 DICE (Dynamic Integrated model of Climate and the Economy)、RICE (Regional Integrated Climate - Economy model) 模型^①,并先后推出了 RICE - 1999、DICE - 2007、RICE - 2010、DICE - 2010、DICE - 2013R 等不同改进版本以评估气候变化的影响,上述模型已被 IPCC 逐渐采纳。

其中, DICE 是将经济学,碳循环,气候科学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以一种端到端的方式结合起来,建立的高度综合的模型,以便对采取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及步骤做出成本 - 效益的评估和权衡。^② 2013年 Nordhaus 在4月、10—11月分别完成对 DICE 的两次更新,并且开发了 DICE - 2013R 的用户手册,新的 DICE - 2013R model。由于早期的 DICE 模型更多地要依赖于详细的部门预算,同时由于在早期的模型中气候变化损失被高度简化,因而这方法被之后的实践和进一步的研究证明是日益过时的和不可靠的。^③ 因而, DICE - 2013 更替了这种基于即时估计基础上的高度简化的损失函数,而代之以使用更准确的来自 TOL Survey 的货币化赔偿估计,作为模型的出发点。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目前的研究普遍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变量, Nordhaus 在新的模型中添加了相当于货币化损失的 25% 进行调整,以反映这些非货币化的影响。这些变量如下:一是如生物多样性、海洋酸化和政治反应等因素引致的损失的经济价值;二是如海平面上升,海洋环流,加速的气候变化等极端事件的影响;三是如灾难性事件以及很长期的气候变暖等那些本来就很难进行模型化的影响因素;四是几乎所有的从经济增长到损毁的因素本身固有的不确定性。这种调整是与其他的研究相一致的,如 Hof 和 Hope^④,以及 Anthoff 和 Tol^⑤。当然这种调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定性判断性质的调整, DICE - 2013R 假定损失是温度变化的二次函数,而并未包括明显的阈值或临界点,不过这也与 Lenton 等人的调查结果相一致。

① Nordhaus William D. 2010. "Economic Aspects of Global Warming in a Post - Copenhagen Environmen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7 (26).

② Nordhaus W. D., Boyer J. 2000. "Warming the World: Economic Models of Global Warming".

③ William Nordhaus, Paul Satorc. 2013. *DICE - 2013R*. Yale University, 2nd Edition.

④ Hof A. F., Hope C. W., Lowe J., Mastrandrea M. D., Meinshausen, M., Van Vuuren D. P. 2011. "The Benefits of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in 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 The Role of the Carbon Cycle and Climate Component." *Climatic Change*, 113 (3 - 4).

⑤ D. Anthoff, R. S. J. Tol. 2013. "The Uncertainty about the Social Cost of Carbon: A Decomposition Analysis Using Fund", *Climate Change*, 117 (3).

Anthoff 和 Tol 在 2013 年则发表了更详细描述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的模型,对碳排放社会成本的不确定进行了参数分解,认为一些参数短期内对社会成本有显著的影响,另一些参数则是从长期的角度更有影响,而有的参数仅仅针对特定的区域产生影响。另外有的参数已经得到大家的共识,有的则不然。从伦理价值上看,如时间偏好与风险规避的纯价格确定,影响的不仅仅是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而且影响着决定碳价值本身的参数的重要性程度。然而某些参数,则自始至终都是重要的,如制冷的能源需求,移民,气候敏感性和农业。

(二) 减排政策路径

其一,碳税和配额制。Kazuharu 和 Jota (2013)^①研究了当两个化石能源消费国(非合作)通过碳税和配额制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时的监管政策,认为化石燃料价格变化引起的碳泄漏的存在影响了碳税—配额的等效性。他们在双层博弈框架下分析两个国家选择减排工具的不同动因,找到子博弈的完美纳什均衡,这为解释某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如哪些减排政策或工具更加严格,不同的国家为何选取不同的减排政策,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倾向于排放税,而发达国家倾向于排放配额。Winchester 和 Rausch (2013)^②在可替代性化石燃料供给弹性和要素流动的假设前提下,以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研究碳泄漏,他们的结论认为,化石燃料的供给弹性必须相等或者接近与无穷大,方能产生负的碳泄漏,而经验估计化石燃料的供给弹性往往小于 1,因此,从 CGE 模型得出的碳泄漏往往是不可能为负值。

其二,自愿性认证。Foster Andrew D 和 Gutierrez Emilio (2013)^③利用墨西哥清洁工业项目的数据,研究了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自愿性认证,认为在低收入国家,自愿认证能够为强制监察提供一个重要的补充,作为环境监管的基础。

其三,低碳城市。低碳城市是减排政策路径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国外低碳城市研究是以低碳技术为主线的,涵盖了碳循环、碳排放驱动因素、低碳城市空间规划以及低碳城市发展中的监管治理等方面。Svirejeva (2008)^④等认为,城市扩张导致了自然生态系统转换为城市生态系统,是主要的驱动因素,这种空间生态系统的变化从而引起植被、土壤碳库和碳通量(生态系统通过某一生态断面的碳元素的总量)的一系列变化^⑤。城市碳循环方面主要集中于城市系统内部及跨界物质流动过程中的碳排放清单,因此该系统所涵盖的城市蔓延区和城市碳足迹区不一定毗邻。

低碳城市测度。我国学者构建了综合低碳产出、消费、资源、政策、技术、环境等方面

① Kazuharu Kiyono, Jota Ishikawa. 2013.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olicy under International Leakag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54 (3).

② Winchester Niven, Rausch Sebastian. 2013. "A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Potential for Negative Emissions Leakag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3).

③ Foster Andrew D, Gutierrez Emilio. 2013. "The Informational Role of Voluntary Certification: Evidence from the Mexican Clean Industry Progra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3).

④ Svirejeva H. A, Schellnhuber H. J. 2008. "Urban Expansion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Regional Carbon Emissions: Using the Model Based on the Population Density Distribution." *Ecological Modeling*, 216 (2).

⑤ Pouyata R, Groffman P, Yesilonis I, Hernandez L. 2008. "Soil Carbon Pools and Fluxes in Urban Ecosystem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116 (s1).

的准则层来评价城市的低碳发展^①；以及“四大支撑体系”^②、“5层面31项指标”和基于DPSIR概念模型的低碳城市评价体系，如朱霞、路正南（2013）^③等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模型框架，采用熵权法对评价指标赋权，以克服多指标评价中主观确定权重的缺陷，他们以江苏省13个地级市为例，利用主成分投影法评价城市低碳发展水平，并对其城市低碳经济发展现状进行了综合评价。

低碳生态城市测度。陈晓晶、孙婷、赵迎雪（2013）^④等以深圳市为例，采用比较分析、空间分析等多种方法，开展低碳生态城市指标体系构建，目标是兼顾通用性与地方特性、先进性与可操作性，提供生态城市的量化标准和考核依据。然而上述研究更多地关注于技术层面的因素，如碳生产力、能耗、技术、人均碳排放，以及城市空间结构及循环系统等层面；在评价体系方面，侧重于低碳城市结果和现状的评估，如建立的指标和准则层一般包括经济、资源、环境以及交通、建筑、能源、消费、技术、碳产出、产业结构等显性因素，而对于其中的非技术创新系统等制度性因素未能给予足够的关注，对我国低碳城市建设存在的可持续性陷阱问题更鲜有深入的挖掘。

城市规划。低碳城市的典型规划理念和模式有Jabareen（2006）^⑤的7种设计和4种模式，以及Kenworthy（2006）^⑥的10个关键交通规划功能区界定。监管治理方面，碳交易市场以及城市优化能源结构、新能源推广等是研究的重点，如。新自由主义从全球化、权力分解和下放、市场和个人激励层面研究城市低碳化的监管。^⑦

低碳社区是低碳城市建设得一个重要环节，有的学者在阐述个体行为对构建低碳社区的重要性基础上，提出影响低碳社区建设的个体行为改变的几个困境以及相对应的措施。^⑧郑艳、王文军、潘家华（2013）^⑨提出低碳韧性城市，即在城市治理和规划设计中协同考虑温室气体减排和应对气候灾害风险的不同需要，采用适应性管理理念，实现生态完整性和可持续城市的目标。他们认为低碳韧性城市需要转变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和治理理念，从目标、政策和手段等方面进行协同管理。

① 付加锋、庄贵阳、高庆先等（2010）：“低碳经济的概念辨识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8期。

② 付允、汪云林、李丁（2008）：“低碳城市的发展路径研究”，《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8年第2期。

③ 朱霞、路正南（2013）：“基于DPSIR模型的低碳城市发展评价研究”，《技术经济与管理》第1期。

④ 陈晓晶、孙婷、赵迎雪（2013）：“深圳市低碳生态城市指标体系构建及实施路径”，《规划师》，第1期。

⑤ Jabareen Y. R. 2006: “Sustainable Urban Forms: Their Typologies Models and Concepts.”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6 (1) .

⑥ Kenworthy J. R. 2006. “The Eco - City: Ten Key Transport and Planning Dimensions for Sustainable City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18 (1): 67 - 85.

⑦ Lemos M. C, Agrawal A. 2006.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31.

⑧ 蒋惠琴、张丽丽（2013）：“基于个体行为改变的低碳社区建设研究”，《科技管理研究》，第5期。

⑨ 郑艳、王文军、潘家华（2013）：“低碳韧性城市：理念、途径与政策选择”，《城市发展研究》，第2期。

顾震弘、韩冬青、罗纳德·维纳斯坦等(2013)^①认为通过城市空间规划的两类策略(一类是通过优化城市空间减少能源的需求,另一类是通过优化用能单位的布局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来控制城市物质形态,可以优化城市子系统以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并在南京河西南部地区城市设计以及生态城市建设导则中对这些策略进行了具体应用。

(三) 气候变化研究的方法学

碳泄漏是重点。Baylis等(2013)^②进一步扩展了他们前一年的模型,来探讨存在碳泄漏条件下的单边气候变化政策的成本和有效性问题。他们剔除了减排福利因素,而集中于考察二氧化碳排放税或排放许可证机制所引致的福利损失,发现原先他们认为是负泄露的所有的案例都同时又是由于单边碳税引致福利的损失,相反,正泄露的案例是单边气候政策能增进福利。Carbone进一步发展了Baylis等在2012年讨论过的碳泄漏的新理论路径,Carbone用一般均衡模型对其进行了量化。他在综合评估中发现,Baylis等的新路径能够对碳的净泄露率产生一种负影响,而对碳泄漏控制却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③

(四) 代际公平问题

代际公平的中心议题是贴现率。Tol等(2013)^④讨论了如何运用拉姆齐式为组织原则,如何确定成本收益的长期贴现率,折现率是否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以及贴现率如何在代内和代际间兼容等重要议题。他认为:未来人均消费量增长率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贴现率下降,这种不确定性可以通过观察历史数据或者是平均消费增长率的主观不确定性抑或通过它的波动来评估。拉姆齐公式为代际贴现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而拉姆齐方程的参数确定则是其中关键并具有挑战性的一环。

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对极端气候灾害做出预警研究方面,近年来出现了一系列与健康相关的研究。如Joseph等人跟踪考察了美国联邦环境署的PM2.5预报与癌症发生率下降的关系,认为及时的空气和环境质量预报能够有效地降低癌症的发生率。^⑤但是他们在剔除引发癌症的其他影响因素的关键问题上显然存在障碍。

Deschenes和Greenstone从美国农业产出的角度讨论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认为气候变化

① 顾震弘、韩冬青、罗纳德·维纳斯坦等(2013):“低碳节能城市空间规划策略——以南京河西新城南部地区为例”,《城市发展研究》,第2期。

② Fullerton Karney, Baylis Kathy, Karney Daniel H. 2013. “Leakage, Welfare and Cost - effectiveness of Carbon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3) .

③ Carbone Jared C. 2013. “Linking Numerical and Analytical Models of Carbon Leakag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3) .

④ Tol R. S, K. J. Arrow, M. L. Cropper, C. Gollier, B. Groom et al. 2013. “How Should Benefits and Costs be Discounted in An Intergenerational Context?”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5613,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Sussex.

⑤ Joseph E. Aldy, Marie - Abele Bind. 2013. “Life - Saving Information: Mortality Risk Reduction.” *from Air Quality Index Forecasts*, November 5, 2013 (Draft) .

增加了美国农业的年收益。Fisher (2012)^① 等则对他们的论文提出了质疑,认为 Deschenes 和 Greenstone 仅通过对农业利润和收益率与气候变量的回归分析得出的“气候变化增加了美国农业的年收益”的结论是不对的,原因是除了他们研究中气候数据的不缺省和不准确,以及气候预测的版本是旧版本之外,还有对农业利润的估算有难度。^②

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正在日益贴近现实生活,尤其是在适应和预警方面,今后这一需求会越来越强烈,同时,多学科联合也越来越成为研究的基础条件。

(五) 国际气候制度

其一,国际减排协调。

主要集中于如何协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有效的减排和适应行动。发展中国家认为,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应该得到坚持,但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近年来一直在努力所谓的“趋同 (convergence)”政策,尤其是将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纳入“约束性的减排”范围。对此,基础四国的学者(基础四国专家组,2012)^③ 提出基于“公平获取碳排放空间”的“碳预算”方案。Stavins 则是站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立场,认为,京都议定书的二分法 (dichotomous distinction) 是一种误导,它免除了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约束性减排责任,因而2015年的巴黎会议的成功应该很大程度上基于重新界定附件一、附件二国家的范畴(即将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列入“约束性的减排”范围)。

其二,国际碳市联动。

国际碳市场的联动也是2013年气候变化研究领域较集中的主题。Matthew (2013)^④ 等提出在排放交易许可证可自由转让的前提下,链接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 Cap - and - Trade Scheme 将会降低全球的减排成本。

他们通过考察近十年以来碳市场的发展,检验关于为何系统证实市场联动偏好的一系列假设。他们认为,碳市场联动的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碳市场联动也是一个能够被不同的政治管辖实体用于实现各种目标的多方位决策。

他们证实了许多经济的、政治的和战略的因素在共同决定着是否实行碳市场联动的决策,同时他们还明确了碳市场联动的一些潜在的重要影响,如对国内碳政策失控的可能性(不过从目前来看,这一点似乎并未阻止现实中对碳市场联动的决定)。

① Fisher Anthony C, Hanemann, W, Michael, Roberts, Michael J, Schlenker Wolfram. 2012.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Evidence from Agricultural Output and Random Fluctuations in Weather: Com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 (7) .

② 原文作者在同期刊物中做了回应并确认上述错误。

③ 基础四国专家组 (2012):《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科学认知的报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④ Matthew Ranson, Robert N. Stavins. 2012. “Post - Durban Climate Policy Architecture Based on Linkage of Cap - and - Trade System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8140*, Issued in June, 2012.

因而, Matthew 等^①的结论对于分散的国际碳市场联动在未来后京都时代的国际气候政策架构下发挥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越来越多的分散、直接的碳市场联动网络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混合动力系统模式下的国际气候政策架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英文参考文献

1. Aldy J. E, M. A. Bind. 2013. "Life - saving Information; Mortality Risk Reduction from Air Quality Index Forecasts." Working paper, Harvard University.
2. Amiti M, A. K. Khandelwal. 2013. "Import Competition and Quality Upgrading." *The Reviews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5 (2) .
3. Anthoff D, R. S. Tol. 2013. "The Uncertainty about the Social Cost of Carbon: A Decomposition Analysis Using Fund." *Climate Change*, 117 (3) .
4. Ardelean A, V. Lugovskyy. 2013. "Trade Liberation and Quality Upgrading: Evidence from the U. S. Consumer Expenditure Data." *ETSG Working papers* No. 344.
5. Autor D. H, D. Dorn, G. H. Hanson. 2013.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6) .
6. Baylis K, D. Fullerton, D. H. Karney. 2013. "Leakage, Welfare and Cost - effectiveness of Carbon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3) .
7. Carbone J. C. 2013. "Linking Numerical and Analytical Models of Carbon Leakag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3) .
8. Chen N, Juvenal L. 2013. "Quality, Trade and Exchange Rate Pass - through",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DP9744.
9. Ciani A, Bartoli F. 2013. "Export Quality Upgrading and Credit Constraints." *ETSG Working Paper*, No. 134.
10. Curzi D, Raimondi V, Olper A. 2013. "Quality Upgrading, Competition and Trade Policy: Evidence from the Agri - Food Sector."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Trade Research Consortium's (IATRC's) 2013 Symposium: Productivity and Its Impacts on Global Trade, June 2 -4, Seville, Spain.
11. Démurger S, Shi Li, Hui Xu .2013. "Internal Migration, Family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Happiness in China." IAS Program on "Human Resour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eminar, Hong -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2. Fasil C. B, Borota T. 2013. "World Trade Patterns and Prices: The Role of Productivity and Quality Heterogene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1.
13. Fernandes A. M, C. Paunov. 2013. "Does Trade Stimulate Product Quality."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46 (4) .
14. Fisher Anthony C, Hanemann W. Michael, Roberts Michael J, Schlenker Wolfram. 2012.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Evidence from Agricultural Output and Random Fluctuations in Weather: Com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 (7) .
15. Foster A. D, E. Gutierrez. 2013. "The Informational Role of Voluntary Certification: Evidence from the Mexican Clean Industry Progra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3) .
16. Fullerton Karney, Baylis. 2013. "Leakage, Welfare and Cost - Effectiveness of Carbon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3) .

^① Matthew Ranson, Robert N. Stavins. 2013. "Linkage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s: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Discussion Paper* ES 2013 - 02, Harvard Project on Climate Agreements,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Kennedy School, Nov.

17. Giles J, Dewen Wang, A. Park. 2013. "Expanding Social Insurance Coverage in Urban China." *Research in Labor Economics*, 37.
18. Hallak J. C. and J. Sivadasan. 2013. "Product and Process Productivity: Implications for Quality Choice and Conditional Exporter Prem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 (1) .
19. Henn C, C. Papageorgiou, N. Spatafora. 2013. "Export Qu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MF Working Papers*, WP/13/108.
20. Herman B. Leonard. 2014. "A Short Note on Public Sector Strategy – Building." (<http://www.hbs.edu/faculty/pages/item.aspx?num=17342>, accessed on 07/21) .
21. Hof A. F, Hope C. W, Lowe J, Mastrandrea, M. D, Meinshausen M, Van Vuuren D. P. 2011. "The Benefits of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in 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 the Role of the Carbon Cycle and Climate Component." *Climatic Change*, 113 (3–4) .
22. Kenworthy J. R. 2006. "The Eco – City: Ten key Transport and Planning Dimensions for Sustainable City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18 (1) .
23. Kiyono K, J. Ishikawa. 2013.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olicy under International leakag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54 (3) .
24. Lemos M. C, Agrawal A. 2006.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31.
25. Liang Xiaoyan, Shuang Chen. 2013. "Developing Skills for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Harmony in China: A Study of Yunnan Province" .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16197>) .
26. Jabareen Y. R. 2006. "Sustainable Urban Forms: Their Typologies, Models and Concepts." *Journal of Planning /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6 (1) .
27. Joseph E. Aldy, Marie – Abele Bind. 2013. "Life – Saving Information: Mortality Risk Reduction." *from Air Quality Index Forecasts*, November 5, 2013 (Draft) .
28. Matthew Ranson, Robert N. Stavins. 2012. "Post – Durban Climate Policy Architecture Based on Linkage of Cap – and – Trade System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8140*, Issued in June, 2012.
29. Matthew Ranson, Robert N. Stavins. 2013. "Linkage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s: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Discussion Paper ES 2013 – 02*, Harvard Project on Climate Agreements,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Kennedy School, Nov.
30. Nordhaus William D. 2010. "Economic Aspects of Global Warming in a Post – copenhagen Environmen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7 (26) .
31. Nordhaus William D, Boyer J. 2000. *Warming the World: Economic Models of Global Warming*.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32. Nordhaus William D, Paul Sztorc. 2013. *DICE – 2013R*, Yale University, 2nd Edition.
33. Pouyata R, Groffman P, Yesilonis I, Hernandez L. 2002. "Soil Carbon Pools and Fluxes in Urban Ecosystem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116 (s1) .
34. Robert N. Stavins. 2013. "Climate Convergence." *Harvard Gazette*, Nov.
35. Rodrik D. 2013. "Unconditional Convergence in Manufactur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8 (1) .
36. Svirejeva H. A, Schellnhuber H. J. 2008. "Urban Expansion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Regional Carbon Emissions: Using the Model Based on the Population Density Distribution." *Ecological Modeling*, 216 (2) .
37. Tol R. S, K. J. Arrow, M. L. Cropper, C. Gollier, B. Groom. 2013. "How Should Benefits and Costs Be Discounted in An Intergenerational Context?"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5613*,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Sussex.
38. Vandenbussche H, F. D. Comite, L. Rovegno, C. Viegeln. 2013. "Moving up the Quality Ladder? EU –

China Dynamics in Clothing.” *Journ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28 (2) .

39. Winchester N, S. Rausch. 2013. “A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Potential for Negative Emissions Leakag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3) .

中文参考文献

1. 陈昊、陈建伟、赵春明 (2013): “出口持续度与女性就业: 基于企业数据的反事实分析”, 《经济研究》, 增刊第1期。
2. 陈晓晶、孙婷、赵迎雪等 (2013): “深圳市低碳生态城市指标体系构建及实施路径”, 《规划师》, 第1期。
3. 戴翔、张雨 (2013): “开放条件下我国本土企业升级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昆山制造业企业问卷的分析”, 《经济学》(季刊), 第4期。
4. 都阳 (2013): “制造业企业对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反应: 基于微观数据的观察”, 《经济研究》, 第1期。
5. 樊纲 (2011): “通过制度改革实现无悔减排”, 《开放导报》, 第4期。
6. 范红忠、黄永明、连玉君 (2013): “就业生命时间、劳动者收入的持久性与我国居民消费率——基于省际职工收入占比和非职工收入占比的面板数据分析”, 《经济学》(季刊), 第4期。
7. 付加锋、庄贵阳、高庆先 (2010): “低碳经济的概念辨识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第8期。
8. 盖庆恩、朱喜、史清华 (2013): “劳动力市场扭曲、结构转变和中国劳动生产率”, 《经济研究》, 第5期。
9. 顾震弘、韩冬青、罗纳德·维纳斯坦等 (2013): “低碳节能城市空间规划策略—以南京河西新城南部地区为例”, 《城市发展研究》, 第2期。
10. 郭万达等 (2011): “低碳政府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估”, 《开放导报》, 第4期。
1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院能源所课题组 (2009): 《中国2050年低碳发展之路—能源需求暨碳排放情景分析》, 科学出版社。
12. 黄燕萍、刘榆、吴一群、李文溥 (2013): “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 基于分级教育的效应”, 《经济研究》, 第4期。
13. 贾男、甘犁、张劼 (2013): “工资率、‘生育陷阱’与不可观测类型”, 《经济研究》, 第5期。
14. 简必希、宁光杰 (2013): “教育异质性回报的对比研究”, 《经济研究》, 第2期。
15. 蒋惠琴、张丽丽 (2013): “基于个体行为改变的低碳社区建设研究”, 《科技管理研究》, 第5期。
16. 李海崢、贾娜、张晓蓓、Barbara Fraumeni (2013): “中国人力资本的区域分布及发展动态”, 《经济研究》, 第7期。
17. 李云森 (2013): “自选择、父母外出与留守儿童学习表现—基于不发达地区调查的实证研究”, 《经济学》(季刊), 第3期。
18. 林毅夫、陈斌开 (2013): “发展战略、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 《经济学》(季刊), 第4期。
19. 马弘、乔雪、徐嫻 (2013): “中国制造业的就业创造与就业消失”, 《经济研究》, 第12期。
20. 钱学锋, 王胜, 陈勇兵 (2013): “中国的多产品出口企业及其产品范围: 事实与解释”, 《管理世界》, 第1期。
21. 卿石松、郑加梅 (2013a): “‘同酬’还需‘同工’: 职位隔离对性别收入差距的作用”, 《经济学》(季刊), 第2期。
22. 卿石松、郑加梅 (2013b): “专业选择还是性别歧视? ——男女大学生起薪差距成因解析”, 《经济学》(季刊), 第3期。
23. 盛丹、王永进 (2013): “产业集聚、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与企业的融资成本”, 《管理世界》, 第6期。
24. 世界银行 (2013): 2013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5. 宋锦、李实 (2013a): “城乡一元化户籍改革影响劳动力职业分布”, 《世界经济》, 第7期。
26. 宋锦、李实 (2013b): “小城镇户籍改革对劳动力市场职业分割的影响”, 《中国农村经济》, 第10期。
27. 孙楚仁、田国强、章韬 (2013): “最低工资标准与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 《经济研究》, 第2期。
28. 万海远、李实 (2013): “户籍歧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经济研究》, 第9期。
29. 王智勇 (2013): “成长环境与人力资本形成”, 《经济研究》, 增刊第1期。
30. 魏下海、董志强、黄玖立 (2013): “工会是否改善劳动收入份额? —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 《经济研究》, 第8期。
31. 邢春冰、贾淑艳、李实 (2013): “教育回报率的地区差异及其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经济研究》, 第11期。
32. 张坤民、潘家华等 (2008): 《低碳经济论》,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33. 郑艳、王文军、潘家华等 (2013): “低碳韧性城市: 理念、途径与政策选择”, 《城市发展研究》, 第2期。
34. 朱霞、路正南等 (2013): “基于 DPSIR 模型的低碳城市发展评价研究”, 《技术经济与管理》, 第1期。